

# 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

张 锋, 张 杉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心理与行为研究所,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 为探讨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的现状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的关系, 采用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共赢观量表和积极未来自我问卷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青年人的共赢观及其五维度(诚信性、先进性、利他性、和谐性、协同性)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社会经济地位、共赢观、积极未来自我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未来自我对共赢观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积极未来自我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共赢观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 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密切相关,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积极未来自我的中介作用对共赢观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 新时代青年; 共赢观; 社会经济地位; 积极未来自我

[中图分类号] B 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2)06-0013-07

## 一 引言

共赢观(Win-win values)是个体在寻求自身利益时能够主动考虑并照顾他人利益, 以互惠互利为基础来实现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包括诚信性、和谐性、先进性、利他性与协同性5个维度, 这是自利、互利、共利的实现, 体现了一种道义和价值取向<sup>[1-2]</sup>。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共赢观思想, 如“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境界, “丈夫贵兼济, 岂独善一身”的道德情怀, 这些价值理念异于“你死我活”的输/赢思维。实际上, 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个体如果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并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对方失败的基础上(我胜你负), 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其结果是损人也不利己。2021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强调, 我们应该顺应历史大势, 坚持合作, 坚持互利共赢, 不搞零和博弈,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正确

义利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 和睦相处、合作共赢, 繁荣才能持久, 安全才有保障。此外,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也从整体利益观出发, 强调以共同利益为前提, 承认与尊重各方差异, 在争取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利益<sup>[3]</sup>。综上, 共赢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汲取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凸显全局性视野和整体性思维, 致力于以共同发展为合作导向的价值取向。共赢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义利观,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不仅有助于构建携手并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且能够加快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目前, 西方社会由于过分强调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与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 鲜有共赢观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 与共赢观有关的许多研究主要聚焦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 较少从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视角对共赢观进行深入探讨。最近, 有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共赢观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初步探讨, 结果表明, 共赢者最重要的十项特征分别是: 讲诚信, 能够尊重他人, 具有全局意识, 具有团队精神, 乐于与人团结合作, 追求彼此间共同利益, 理解体谅他人, 善于换位思

[收稿日期] 2022-07-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时间自我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研究”(18BSH112)

[作者简介] 张锋(1976—), 男, 河南汝南人,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

张杉(1995—), 女, 四川巴中人,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

考,善于倾听以及善于与人沟通交流。而且,共赢观可细分为诚信性、利他性、先进性、协同性与和谐性。具体来说,诚信性侧重于诚实守信,利他性是基于他人利益视角而行动,先进性意味着共赢者要追求卓越与进步,协同性注重整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和谐性强调相互尊重与彼此包容<sup>[1]</sup>。在此基础上,研究者编制了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的共赢观量表,进一步验证了共赢观的五维结构模型(诚信性、先进性、利他性、和谐性、协同性)<sup>[4]</sup>。在该理论模型中,诚信性是共赢观的基础,利他性是共赢观的前提,先进性是共赢观的动力,协同性是共赢观的机制,和谐性是共赢观的核心。所以,这五个维度密切相关而共同构成共赢观。

新时代青年共赢观的培育,对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发展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点,青年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取向不断增强,使得竞争价值观略占上风,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则有可能出现为个人利益而损人利己、物欲横流等极端个人主义行为<sup>[5]</sup>。而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当今社会倡导的“合作共赢”发展取向<sup>[6]</sup>。对于当代青年价值观越发突出个人价值主体地位、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的青年价值取向有明显差异等动向,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研究与引导<sup>[7]</sup>。倡导共赢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路径,有助于新时代青年以开放态度包容差异,以对话方式解决冲突,以合作方式谋求共赢,从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的现状特点及其相关影响机制,从而科学引导与培育青年人对共赢的价值追求,以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先,青年的价值观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有关。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体生理、心理、行为等多方面的重要因素,而这些方面又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条件<sup>[8-10]</sup>。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使个体更倾向于关注短期结果而忽视长期结果,即相对贫困使个

体更可能忽视长远利益<sup>[11-12]</sup>,更多考虑个人利益而缺乏合作,不利于共赢观的形成。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对共赢观具有显著影响。

其次,自我在青年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时间维度上,自我可以分为过去自我、现在自我和未来自我<sup>[13]</sup>。未来自我是个体对未来自己的认知和评价,是一种可能自我或者理想自我。积极未来自我(positive future self)是个体对未来自己的积极认知和评价。相关研究发现,思考自己的未来是大多数年龄段群体的特征,而在思考未来的同时,人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看法也不断地被塑造<sup>[12]</sup>,这深刻影响着个体价值观的形成。根据“三因素洋葱模型”,相对贫困个体的消极自我观念会导致消极的价值观<sup>[14]</sup>。自我感觉良好的个体对自己的未来有更积极的看法<sup>[15]</sup>。因此,积极未来自我有利于个体以一种使未来生活更美好的方式行事,而合作互助则可以让彼此获益而达成共赢,由此形成互惠互利的共赢观。所以,本研究提出假设2:积极未来自我对共赢观具有显著影响。

最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通过积极未来自我而影响价值观。现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童年忽视与自我连续性的中介作用而对共赢观产生影响<sup>[16]</sup>。社会经济地位是时间自我的重要影响因素<sup>[17]</sup>,并与未来自我连续性密切相关<sup>[18]</sup>。处于边缘地位(marginal position)长大的个体会逐渐内化由于意识到不太可能获得成功而形成的无望感与绝望感<sup>[19]</sup>。由此可见,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倾向于对未来自我持有消极的认知与评价,而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更加稳定,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与更好的教育资源,因而对未来自我有着积极的认知与评价。这说明,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个体对未来自我的态度<sup>[15]</sup>,而未来自我又进一步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积极未来自我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共赢观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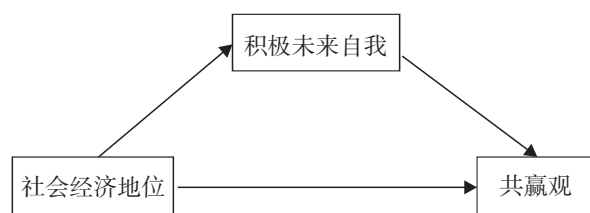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的关系模型

因此,本研究对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及其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从而探索共赢观的教育对策与路径。

## 二 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通过网络以及现场招募的方式选取研究对象,年龄范围为18~44岁<sup>[20]</sup>,本研究共获得407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33人,女性274人;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有188人,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有219人;独生子女109人,非独生子女297人,缺失独生子女信息1人。

### (二) 研究工具

1. 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该问卷从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以及家庭月收入等三个方面测量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sup>[21]</sup>。父母受教育程度选择父母双方中最高学历的一方数值作为最终值,将其赋值1~5;父母职业按照等级对其赋值1~5;家庭月收入按照不同收入区间选项进行选择,将结果赋值1~12。将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月收入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各项相加得到总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 共赢观量表。该量表由Zhang等人编制<sup>[4]</sup>,包括16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被试根据句子描述选出最符合自身情况的选项。分数越高,代表共赢观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8。

3. 未来积极自我问卷。从黄希庭和张蜀林的人格形容词表<sup>[22]</sup>,筛选出时间自我评价词汇,并根据以往研究<sup>[23]</sup>选择了15个从积极方面来描述未来自我的词语,组成积极未来自我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完全符合”),被试根据句子描述选出最符合自身情况的选项。分数越高,代表未来自我越积极。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3。

### (三)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 三 结果与分析

###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虽采用了匿名问卷作答的方式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效应,但仍属于自我评价测量。因此,有必要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7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31.26%,低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二) 共赢观的现状特点

####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对共赢观量表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量表总分及其5个维度(诚信性、先进性、利他性、和谐性、协同性)得分的平均值都大于3,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呈负偏态分布。

表1 共赢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最小值	最大值	$M$	$SD$	偏度	峰度
共赢观	1	5	3.89	0.50	-0.24	0.36
诚信性	1	5	4.45	0.59	-1.28	3.11
先进性	1	5	3.72	0.73	-0.47	0.38
利他性	1	5	3.88	0.63	-0.47	0.59
和谐性	1	5	3.88	0.61	-0.48	0.70
协同性	1	5	3.53	0.76	-0.46	-0.04

#### 2. 人口学变量差异检验结果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性别、家庭所在地和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共赢观的性别差异边缘显著( $p=0.058$ ),男青年的共赢观低于女青年。虽然城市青年的共赢观平均值高于农村青年,非独生子女青年的共赢观平均值高于独生子女青年,但均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p>0.05$ )。

表 2 共赢观的人口学变量差异分析

变量		<i>n</i>	<i>M</i>	<i>SD</i>	<i>t</i>	<i>p</i>
性别	男	133	3.82	0.56	-1.91	0.058
	女	274	3.93	0.47		
家庭所在地	城市	188	3.92	0.49	0.99	0.325
	农村	219	3.87	0.52		
独生子女	是	109	3.84	0.51	-1.31	0.191
	否	297	3.91	0.50		

（三）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法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3）。结果显示，共赢观和积极未来自我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r=0.66, p<0.01$ ），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显著正相关（ $r=0.10, p=0.04$ ），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未来自我之间显著正相关（ $r=0.12, p=0.02$ ）。这说明，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密切相关。

表 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

变量	<i>M</i>	<i>SD</i>	1	2
1 共赢观	3.89	0.50	—	
2 积极未来自我	4.12	0.55	0.66**	—
3 社会经济地位	11.91	4.95	0.10*	0.12*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四）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对共赢观的回归分析

以共赢观为结果变量，分别以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未来自我为预测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表 4）。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 $\beta=0.10, p=0.037$ ）和积极未来自我（ $\beta=0.66, p<0.001$ ）对共赢观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未来自我是共赢观的重要影响因素，验证了假设 1 和 2。

以共赢观为结果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未来自我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 4）。结果表明，积极未来自我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共赢观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说明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积极未来自我的中介作用对共赢观产生显著的影响，验证了假设 3。

表 4 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对共赢观的回归分析

步骤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2$	<i>F</i>	$\beta$	<i>t</i>
1	共赢观	社会经济地位	0.01	4.36	0.10	2.09*
2	共赢观	积极未来自我	0.44	320.15	0.66	17.8***
3	共赢观	社会经济地位	0.44	160.12	0.03	0.71
		积极未来自我			0.66	17.68***

\*表示  $p<0.05$ ，\*\*\*表示  $p<0.001$ 。

四 讨论

共赢观源于“中庸”“和谐”“仁爱”“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sup>[1]</sup>，并与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sup>[3]</sup>密切相关，可视为一种“共赢”博弈。合作共赢是我国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核心理念，合作是手段，共赢是目的<sup>[24]</sup>。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的多元与多变，在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的过程中，也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冲击。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已发展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个体需站在全

局的整体层面来考虑自身发展与共同发展，不能以损害别人利益为代价来过分追求自身利益，而应彼此均能受益以实现共赢。可以看出，共赢不是“零和博弈”，也非“独善其身”，而是一种有远见的和谐发展，不仅利他，而且利己，也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共赢观符合全人类社会发展利益，必然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的现状特点

首先，本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在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青年作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其价

值追求会影响到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sup>[8]</sup>。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应当胸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积极践行共赢观,充分展示文明古国与泱泱大国青年的气度和格局,彰显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其次,本研究发现,不同人群的共赢观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次调查中,男青年的共赢观边缘显著低于女青年,城市青年的共赢观水平稍高于农村青年,独生子女青年的共赢观水平稍低于非独生子女青年。这些结果提示,只有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进行精准施策,进一步加强男青年、农村青年与独生子女青年群体的共赢观引导,才能更全面推进共赢观的培育工程。

(二) 社会经济地位、未来积极自我对共赢观的影响及其机制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未来积极自我不仅是共赢观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未来积极自我的中介作用对共赢观产生显著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对声誉和印象管理的关注程度更高<sup>[25-27]</sup>,在公众环境中会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up>[25-26]</sup>,更愿意与人合作<sup>[27]</sup>。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享有更多的资源,包括金钱、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受教育资源等,所以遭受到的生活压力相对较小,体验到的情感更积极,拥有更高的自尊、自信和生活满意度<sup>[28-29]</sup>。而且,人们对自身的未来态度越积极,能够激发的积极情绪也更多<sup>[28]</sup>,这使其在寻求自身利益时更能够考虑到他人,从而实现彼此的共同利益,在人际互动中达成共赢<sup>[29]</sup>。

与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常常缺乏资源,并不倾向于把现在自我延伸至未来,且无意将现在与未来建立联结<sup>[30]</sup>。因此,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对未来自我的态度不够积极,减少了需要付出成本的亲社会或者合作行为<sup>[25]</sup>,难以形成共赢观。

## 五 教育启示

首先,要切实引导新时代青年自觉树立与践行共赢的价值观。这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路径<sup>[31]</sup>。一方面,要以正确的义利观培育为抓手<sup>[32]</sup>,不断消除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引导新时代的不同青年群体将个

人价值的实现融入集体与社会价值的实现之中,在平凡岗位上为集体与社会作贡献,实现个人、集体与社会的相互成就,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积极培育和践行共赢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可以从深化价值认同、加强人文关怀等方面综合发力。如通过微信、微博等渠道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夯实新时代青年的共赢价值观基础。广大社区可以积极组织青年参与爱心公益活动、社会文化活动,在实践中强化青年的共赢思想认知。

其次,要为青年的成长发展提供新助力,让青年在新时代更好发展,更有作为,不断提升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个体,其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在很多方面可以自给自足,从而产生更多的自我导向型情感,拥有更多的自豪感与满足感,这使他们的未来自我更积极<sup>[33]</sup>。从传承动机的角度来讲,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具有更强的掌控感,会对当下的自我持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并倾向于在未来继续维持这种高社会经济地位,愿意将当下积极的自我延伸到未来。同时,高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意味个体的成功,这也会使个体对自我价值持肯定态度,并能更好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危机<sup>[34]</sup>。因此,要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青年人获得资源共享、向上发展的新时代机遇,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让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树立共赢观。

最后,要通过多种路径提升青年的积极未来自我。健全人格者能以辩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将来,对未来自我的评价总体是积极的<sup>[35]</sup>。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的未来自我越积极<sup>[36]</sup>。在相对贫穷环境中长大的人们更倾向于关注当下而非未来,而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延迟奖励,更加关注未来<sup>[37]</sup>。具体来说,在当前处于生活环境不稳定的时候,个体会感到压力并有消极情绪,这又反过来影响个体对未来的思考,提示自己未来和现在的相似性,导致其更加关注当下而非未来<sup>[38]</sup>。另外,相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个体,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具有更多的消极自我<sup>[39]</sup>,他们由于物质资源缺乏以及不良生活环境而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拥有更少的积极情绪<sup>[40]</sup>。因此,要让青年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感,提升积极的未来自我心态,通过互利合作促进和谐

发展, 培育共赢观的内生动力。

## 六 结束语

新时代青年的共赢观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共赢观、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社会经济地位和积极未来自我对共赢观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积极未来自我的中介作用对共赢观产生显著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张锋, 张杉. 公众共赢观的结构探索 [J]. 社区心理学研究, 2020 (10): 113-124.
- [2] 李德周, 杜婕. “共赢”——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建设性思维方式 [J]. 人文杂志, 2002 (5): 140-147.
- [3] 王睿腾. 习近平合作共赢理念的传统文化内涵 [J]. 学理论, 2019 (11): 7-9.
- [4] ZHANG S, ZANG X, ZHANG F.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win-win scale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5): 1-10.
- [5] 周晓虹. 从青年入手重塑中国人的价值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 年)》的精神启示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3): 35-40.
- [6] 沈潘艳, 辛勇, 高靖, 等. 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变迁 (1987-2015) [J]. 青年研究, 2017 (4): 1-10.
- [7] 杨艳. 文化热点与青年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转变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8): 79-83.
- [8] 李从松. 贫困对贫困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J]. 青年研究, 2002 (2): 5-9.
- [9] 马顺林. 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成长过程中的断裂与失衡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 (4): 34-37.
- [10] 林芙蓉. 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问题探析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7 (2): 50-54.
- [11] MANI A,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et al.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J]. *Science*, 2013 (6149): 976-980.
- [12] SHAH A K, MULLAINATHAN S, SHAFIR E. Som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too little [J]. *Science*, 2012 (6107): 682-685.
- [13] 黄希庭, 夏凌翔. 人格中的自我问题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2): 108-111.
- [14] 傅安国, 张再生, 郑剑虹, 等. 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 [J]. 心理学报, 2020 (1): 66-80.
- [15] ZEIRA A, DEKEL R. The self-image of adolescent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future [J].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05 (2): 177-191.
- [16] ZHANG F, ZHANG S, GAO 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in-win Values: Mediating roles of childhood neglect and self-continuity [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2 (13): 882-933.
- [17] 张锋, 靳凯歌, 朱豫敏. 时间自我的研究综述 [J]. 心理研究, 2021 (3): 18-24.
- [18] 张锋, 张杉, 臧鑫磊, 等. 家庭经济地位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 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 [J]. 心理研究, 2020 (5): 467-473.
- [19] BROWMAN A S, DESTIN M, KEARNEY M S, et al. How economic inequality shapes mobility expectations and behaviour in disadvantaged youth [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9 (3): 214-220.
- [20] 吴军, 郑昊, 刘润东. 城市舒适性体验与青年幸福感研究——基于 CGSS (2015) 数据的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5): 21-28.
- [21] BRADLEY R H, CORWYN R 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2 (1): 371-399.
- [22] 黄希庭, 张蜀林. 562 个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和熟悉度的测定 [J]. 心理科学, 1992 (5): 17-22.
- [23] 高俊鹏. 应届大学毕业生时间自我、创业效能感与创业意向的关系 [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8.
- [24] 张贤明, 薛佳. 合作共赢: 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核心理念 [J]. 理论探讨, 2016 (5): 5-9.
- [25] HART D, EDELSTEIN W. The relationship of self-understanding in childhood to social class, community type, and teacher-rated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competence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2 (3): 353-365.
- [26] WEININGER E B, LAREAU A. Paradoxical pathways: An ethnographic extension of Kohn's findings on class and childrearing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9 (3): 680-695.
- [27] KRAUS M W, CALLAGHAN B.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J].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016 (8): 769-777.
- [28] 杨娃, 邢禹, 关梅林, 等.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视角下心理资源对中职生亲社会和攻击行为的影响——情绪的中介作用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7 (5): 30-35.
- [29] ZHANG M, AGGARWAL P. Looking ahead or looking back: Current evaluations and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to a temporal self [J]. *Journal of Con-*

- sumer Psychology, 2015 (3): 512-518.
- [30] JOSHI P D, FAST N J. Power and reduced temporal discounting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4): 432-438.
- [31] 黄希庭. 社区心理学导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1.
- [32] 何丽梅.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实现价值观的理性构建 [J]. 人民论坛, 2020 (25): 88-89.
- [33] PIFF P K, MOSKOWITZ J P. Wealth, poverty, and happiness: Social class is differ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emotions [J]. Emotion, 2018 (6): 902-905.
- [34] 徐岩.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幸福感 [J]. 青年研究, 2017 (1): 47-56.
- [35] 黄希庭. 探寻健全人格结构 [M]. 重庆: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1.
- [36] SPENCER B, CASTANO E. Social class is dead. Long live social class! Stereotype threat among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viduals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7 (4): 418-432.
- [37] GRISKEVICIUS V, TYBUR J M, DELTON A W, et al. The influence of mortality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risk and delayed rewards: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6): 1015-1026.
- [38] ANTONOPLIS S, CHEN S. Time and class: H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hapes conceptions of the future self [J]. Self and Identity, 2021 (9): 1-21.
- [39] STEPHENS N M, MARKUS H R, FRYBERG S A. Social class disparitie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Reducing inequality by applying a sociocultural self model of behavior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4): 723-744.
- [40] KRAUS M W, STEPHENS N M.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J].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2 (9): 642-656.
- (责任编辑: 孙永泰)

## Win-win Valu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ZHANG Feng, ZHANG Sha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win-win values of youth in the new era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win-win value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the study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win-win values scale,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win-win values and its five dimensions (integrity, advancement, altruism, harmony, and coordination) of young people are at above average leve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win-win values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and both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exer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win-win values. Positive future self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win-win values. Thus, win-win valu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ositive future self,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produce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s on win-win value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future self.

**Key words:** youth in the new era; win-win values; socioeconomic status; positive future self